

Юрий Трифонов

Другая жизнь



我只写那些我认为需要写的东西。我一点也不会按照订货单去写作。

——尤里·特里丰诺夫

另一种生活

苏联·尤里·特里丰诺夫 著
徐振亚 译

Юрий Трифонов

Другая жизнь

·种生活

里·特里丰诺夫 著
徐振亚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种生活/(苏)特里丰诺夫著;徐振亚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外国中篇小说经典)

ISBN 978-7-5321-4983-4

I. ①另… II. ①特… ②徐…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IV.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6636 号

总策划:黄育海 陈 征

出版统筹:陈 丰

策划编辑:任 战

责任编辑:陈 蕾

封面设计:董红红

另一种生活

〔苏联〕尤里·特里丰诺夫 著

徐振亚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n.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9,000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83-4/I · 3912 定价:28.00 元

Novella
·————— 2
中经典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 Long short story 勉强算一个，可是，顾名思义，Long short story 的着眼点依然是短篇，所谓的中篇小说，只不过比短篇小说长一些，是加长版的或

加强版的短篇。 “讲去合”与“小篇中

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 Novus 这个单词无法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 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 Novella、德语里的 Novelle 和英语单词 Novel 都是从 Novus 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一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绝不是“中篇男人”。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小说家需要对西方的文学传统负责任么？不需要。这个回答既可以理直气壮，也可以心平气和。

我第一次接触“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是在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发育并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

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没有一个国家的中篇小说比中国新时期的中篇小说更繁荣、成气候，这句话我敢说。嗨，谁不敢说呢。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当然，我绝不会说西方的中篇小说不行，这样大胆的话我可不敢说。虽然没有明确的“中篇”概念，他们的“长短篇”或“短长篇”却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记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与海》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目录

另一种生活 .001

交换 .179

再版译后记 .251

另一种生活

献给阿拉

半夜，她又醒了。现在，每天夜里她都会醒来，仿佛总有人恶作剧地将她推醒：你要想，想，一定要弄个明白！但是除了自己折磨自己以外，她对一切都无可奈何。而唤醒她的那股力量又固执地要求：非想出来不可！其中必有原因，而祸根往往在朝夕相处的亲人身上。再也没法活下去了，她自己必须去死。不过要弄清楚，她有什么过错呢？此外，还有一层隐秘的、使人羞愧的想法：难道一切就此完了吗？“我真傻！怎么能想到死呢？我还还有一个女儿呢！”

然而，她轻易地想到了死，就像想起一件令人不快、却又无法回避的事情，就像必须住院动手术一样。死的念头要比回忆轻松得多。回忆引起痛楚，而自尽的念头带来的仅仅是瞬息即逝的沉思。瞧，回忆又开始了：他在博物馆领到工资以后——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往往在博物馆附近的“谢瓦”饭店喝得醉醺醺地回来，要不然就是被费奥特罗夫拉到自己家里，在那边久坐忘返。他一到家里，总是倒头便睡，转眼间就沉入梦乡。但是半夜三四点钟必定醒来，就像她现在这样。他跌跌撞撞地到厨房里找水喝或者从冰箱里找饮料，妨碍她睡觉，于是她恼火了，在蒙眬中骂了起来。在被他吵醒的那个时刻，她对他简直是仇恨的：“你真自私！”

他常常瞒着喝酒的事儿，像个高明的演员，不露半点痕迹。她既闻不出酒味，也发现不了他眼睛里布满的红丝，一味相信他的话：“累得像条狗似的！”她甚至可怜他，赶快给他铺好被褥，他就马上钻进被窝呼呼大睡起来。可是一到半夜，必然露出马脚，他不到天明就很早醒了。现在她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不过她喝的是记忆的苦酒。白天，无论在上班的时候还是在家里，她尽力掩饰，不让任何人觉察。不能让伊琳卡看出来，更不能让婆婆看

出来，不然，痛苦无疑会加深。白天，她尚能应付，可是到了夜间，就力不从心了。

有时候，他不喝酒也会半夜醒来——真是莫名其妙。完全是胡闹。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经常失眠。可他还不是老头儿，于是她恼火，因为她很容易惊醒，只要他开始唉声叹气或者辗转反侧，她就醒了。尤其他看表的时候，总要把她吵醒——他从睡衣箱盖上拿起手表凑到眼前来看时，总不免把金属表带碰磕到箱子而发出声音。为这事不知费了多少口舌了。她真生气。唉，多么荒唐。说来也真可怜，虽然他看表时尽量避免发出声响，可不知为什么始终做不到，总会有东西碰到箱子，譬如金属表带头啦，或别的什么——于是声响照旧。夜深人静，声音格外清晰刺耳。只要他开始叹息，她就醒了，微微打个寒噤，屏住呼吸，怀着一颗紧缩的心等待着碰磕声。

婆婆依然和她同住一套房子，她又能到哪里去呢？

婆婆固执地认为，儿子去年十一月间，年仅四十二岁就猝死于心脏病是媳妇的罪过。住在一起日子难熬，巴不得永远分离。可是离开了十六岁的孙女伊琳卡，老人就孤苦伶仃了，她在这种处境里是活不长的（她的妹妹和外甥女并不一定要她住到她们那儿，而亚历山德拉·普罗科菲耶芙娜也未必乐意跟她们在一起生活）。此外，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必须考虑到女儿伊琳卡是非常爱奶奶的，离了奶奶她就完全无人照管了。这一切全被一块结实得难以撕裂的包袱布紧紧地裹着。看来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半夜醒来冥思苦想，白天则离开家去躲起来。现在她渴望着不断出差，虽然这并不应该，同时这也是软弱的表现。伊琳卡比从前更需要她，而她也只能与伊琳卡相依为命。出差期间，她思女心切，简直要想疯了，她心挂两头，每天晚上都要花五个卢布打电话问长

问短，而回家之后又发现女儿生活得挺好，正在兴致勃勃地忙着自己那些孩子的事儿。这使她略为放心，尽管这同时又给她增添了痛苦，于是她又向往出差，企望求得解脱。虽然自己事前就已经知道，什么也救不了她。哎，要是老人住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她会怎样疼爱她，敬重她呀！可是在这几个小房间里，在这狭窄的走廊里，过去的岁月排得满满的，一年挨着一年，看上去一目了然，丝毫不差，就像衣架下面谢廖沙钉的木箱里摆着的一双双穿坏的便鞋。在这拥挤、密不通风的地方，就是没有怜悯的位置。婆婆会说：“我记得您以前没有买过这种小圆面包。这是哪儿买的？基洛夫大街吗？”一句话就把那份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怜悯之心驱散尽了。言外之意是：从前没有给丈夫买他爱吃的小圆面包，而现在买了给自己享受。这类琐碎的小事，这种种可笑愚蠢的小问题，像铁锤一样敲击着、伤害着她的心灵。这委实是一种捉弄和折磨。

电视机的事也像圆面包一样折磨人。很久以前，那时谢廖沙还健在，就想买一台新式的大屏幕电视机，替换原来那台老式的，况且已经攒了钱。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经常发脾气，也许不该那样，可是我的天哪，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她经常无缘无故地生气，无法克制自己。平心而论，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现在回想这些事也成了一种折磨。他可以忘掉一切，连续几小时看各种体育比赛的转播。他躺在绿色的沙发上，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烟，一只圆形的金鱼烟灰缸放在身边的地板上——他仿佛是被粘住了一般，怎么叫也叫不动，怎么喊也喊不起。可是那些节目为什么一个不漏地都要看呢？难道全都那么有趣吗？我在休息！我究竟有没有休息的权利？他的恼怒有些做作：要让大家都知道，工作把他累坏了。

他的确很累，又遇到种种不快，可是他缺乏忍耐心。再则，他瞒啊，瞒啊，许多事情要到后来才肯透露底细。她把自己的烦恼倾吐出来，聊以自遣，而他却把自己的挫折瞒着，羞于启齿，于是就半真半假地在电视机前抱怨：“先生们，我的神经细胞需要休息，狗要吃草，知识分子爱听音乐，而我想看体育比赛。这是一种治疗方法，我的专用药，供我喝的叶谢度基矿泉水，你们不理解，真是岂有此理，先生们……”

这样的玩笑司空见惯，可亚历山德拉·普罗科菲耶芙娜总要一本正经地为谢廖沙辩护。有时候为了给儿子撑腰，也不管是什么比赛，索性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看起冰球或排球赛来，其实什么比赛她都无所谓，她与儿子偶然议论几句，而她的高论几乎使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忍俊不禁。他也往往转身对着她，语意双关地——可是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一听就懂——与亚历山德拉·普罗科菲耶芙娜开几句玩笑，可是老人始终装出对体育十分爱好的样子。噢，真的，三四十年前，她还是个旅行迷呢！前不久，她还穿起老式的草绿色裤子和军事共产主义时代那种不伦不类的上装，挎上那只只配装破烂的背包，独自一人乘上电气火车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谢廖沙没有大惊小怪。他不允许别人取笑母亲，即使在背后也不行。看样子，她重新游历了从前同自己的丈夫，谢廖沙的父亲，那位数学教授，热心的旅行者和摄影爱好者一起到过的那些地方。婆婆这一身克雷连科^①时代的旅行装束，真令人啼笑皆非。附近的几个傻瓜，看守院子的几个女人讥笑她。这连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都感到讨厌，而伊琳卡简直受不了。谢廖沙的父亲在一九四一年自愿参加民兵，秋天就牺牲在莫斯科

^①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1885—1938），前苏联政治活动家。一九三一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司法部长，一九三六年任全苏司法部长。

近郊。对这位老人种种可悲的怪脾气尚且可以谅解，为什么偏偏就对她，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不能谅解呢？为什么不体谅她的痛苦？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促使婆婆，这个学过法律也并不愚蠢的女人来承认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也有悲伤的权利。

“那当然，买台电视机吧！别三心二意啦！”当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傻乎乎地决定跟她商量时，她这样说。

伊琳卡缠着要买大屏幕电视机，而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倒也不在乎。事也凑巧，就在隔壁一幢大楼里，伊琳卡常去的那家百货商店刚好新进了一批名牌电视机，因此要赶快决定下来。

“我跟你说：买吧！你为什么有福不享呢？”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说，她哪有心思享受。

“我懂，可您总不想进修道院吧！”“是的，我不想进修道院，这是事实。”

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故意话中带刺，因为婆婆提起“享受”之类也是为了刺她。

“别再自寻烦恼啦，快把钱取出来，谢廖沙攒钱也是准备买电视机，这本是他的意愿……”亚历山德拉·普罗科菲耶芙娜那张鞑靼老妇人似的扁平而瘦削的脸上立即收敛起慈祥的笑容，她那双透蓝的、两条细缝似的眼睛——谢廖沙也是这样的一双眼睛——流露出冷漠的神情。

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听了这些蜇人的话，感到气愤，她故意和婆婆怄气，偏偏决定不买电视机了。她对伊琳卡大声呵斥，而伊琳卡则吵闹不休。后来，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更加生气，又决定买了——于是就买了一台。婆婆整整四个月没有看电视，说是为了保护视力，生怕眼睛受到刺激，实际上是一种示威。有一位熟人劝说过，你们婆媳同病相怜，小姑娘又是大家的心头肉，

慢慢会相处习惯的。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也曾想过，也许两人之间的关系可望好转，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确信无疑：这是不可能的，永远也不可能。

事情发生在一月份，离现在两个月还不到，不堪忍受的痛苦煎熬着她。当时她简直没有勇气活下去。有一天夜里，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伤心得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于是起来到厨房里伤心落泪，忽而喝点瓦洛可啶^①，忽而从茶壶里倒凉茶喝。突然，她听到亚历山德拉·普罗科菲耶芙娜也趿拉着鞋上厨房来了。老人也睡不着，她拖着拖鞋，走路的声音像一根根钢针扎进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的心窝。多熟悉的声音啊！拖鞋是谢廖沙的，老人不知为什么拿去自己穿了，她还把他的一条绿色驼绒被也拿去盖了。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仿佛觉得，走过来的是谢廖沙。往日他们一家三口聚在厨房里的时候，他头戴一顶用报纸折叠成的尖帽，走到门口，举起一只手说：“你们好，我可怜的人们！”伊琳卡笑得前俯后仰。他一直想使全家和睦、亲热，哪怕暂时也好，哪怕用玩笑也好。现在，这阵脚步声使她顿时想起了往事，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这多么可怕而又不可饶恕，因为谁也不该看到她的眼泪。亚历山德拉·普罗科菲耶芙娜走进厨房——她只穿衬衫，一头白发蓬乱地披散着，蜡黄的脸上流露出不满——朝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瞟了一眼，走到餐橱跟前，取出杯子，倒了一杯水。不，她没有把水递给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她倒水是给自己喝。她似乎没有发现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在痛哭，用她惯常埋怨旁人的腔调问：

“我们家的苏打在哪儿？”

^① 瓦洛可啶，一种扩张血管的药。

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没有搭理她，走出了厨房。

她的问话以及视而不见的目光——这是永远无法忘记的。白天掩盖着的东西现在看得清清楚楚，真相往往在夜里才透露出来。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在哭泣，而老人用仇恨的目光瞪着她。最最伤心的谈话往往发生在夜里。有一次夜里他曾经说过，要不是伊琳卡，早就跟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分道扬镳了。她觉得他说的完全是可以置人死地的真心话，她勉强熬到了天亮。到了白天，他又胡诌一通地说起俏皮话来，似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夜间的谈话就像梦魔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过了几个月，夜间又发生了这样的谈话——新年前夕，他又萌发了独自一人去休养所的念头。这使她惊恐万分，她舍不得放他走，恳求他带她一起去，那时候要请十天半个月的假也不难，可是伊琳卡怎么办呢？婆婆当时身体不好，不过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如果是谢廖沙需要，她肯定会放他们走，可是当她知道这是儿媳妇的主意后，就一口回绝了。事情明摆着，这是故意请来了维拉·普罗科菲耶芙娜以及她的女儿，谢廖沙的表妹塔玛拉，一家内部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不喜欢她，也不信她的话。吃晚饭的时候，塔玛拉唠唠叨叨地把亚历山德拉·普罗科菲耶芙娜的病说得很玄乎，显然在夸大病情，制造混乱。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不想使气氛紧张起来，她一言不发，耐着性子，尽管这是令人愤慨的圈套。可是到了夜里，她忍不住叫醒了他，追问起他来——于是又堕入了那种噩梦般的境地，周围的一切都旋转起来，脚下的大地也在摇晃。

“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了外遇，想跟她单独待在一起？”

“是的，有，有了。”他马上醒了，悄悄地说，“这就是我自己。我想跟自己独处一段时间，我想休息休息，离开大家，离开